

敌人 朋友 还是伙伴

——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1999)

刘建飞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敌人 朋友 还是伙伴

——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1899—1999）

刘建飞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敌人 朋友 还是伙伴/刘建飞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1
ISBN 7-5073-0697-6

I. 敌… II. 刘… III. ①中美关系-研究②中日关系-研究 IV. D8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1862 号

敌人 朋友 还是伙伴

著 者/刘建飞
责任编辑/姚建平
封面设计/张 戈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排 版/北京京丰印刷厂
印 刷/北京京丰印刷厂

850×1168mm 32 开 11.875 印张 27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073-0697-6/D·155 定价: 20.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20世纪即将过去。回顾这百年的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影响最大的国家除了俄国—苏联外，当属美国和日本。预计在下世纪，对中国安全和发展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仍将是美日这两个国家。美日是头号 and 二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要实现跨世纪的发展战略目标，就必须保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并扩大对外开放，为此就必须同这两个国家打交道，而且还要打好交道。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求和平、图发展是世界潮流，是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需要，是一切进步力量的崇高事业。中国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1/5的大国，应当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要维护和平，首先要维护中国所在的地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美、日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稳定发展的中美日三角关系是21世纪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所以，从维护亚太乃至整个世界和平的高度来说，中国也必须同美日打好交道。

那么，怎样同美日打好交道，并在这个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利益呢？俗话说，只有很好地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了解现在；只有很好地了解现在才能更好地把握将来。中国同美日已打了100年的交道，也就是说，中美日关系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很好地总结这100多年的历史，无疑对我们现在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美、对日政策，发展中美日三角关系会有很大助益。中央党校刘建飞博士所著的《敌人、朋友、还是伙伴——中美日

战略关系演变》一书在这方面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可以说，该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总结中美日百年关系史的学术专著。作者运用大量的、非常翔实的资料，从战略层面上总结了中美日三国百年交往、合作、斗争、冲突的历史，尤其是三边关系相互影响、促进、制约的过程，提出了许多使人深受启发的观点，其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该书的核心观点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美日三国，和则互利，斗则俱伤；和则亚太安宁，斗则亚太动荡。

近一个时期以来，中美日关系中出现了一些不合谐的因素，如美日共同研究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日本国会众参两院通过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三个相关法案。这些事件恰好与科索沃战争和北约战略新概念出台几乎同时发生，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理由说，美日两国的当权者，还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对中国的崛起存有戒心，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仍存在意识形态偏见。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就说过，日美两国是以共同价值观联结起来的同盟关系。照这种思维方式，中国自然被摆到了美日同盟的对立面。由此看来，在下个世纪，中国与美日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地发展。然而，不管怎样，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全球化、多极化等大趋势不断深化的大环境下，中美日相互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利益，它们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不可逾越的。无论是从三国各自的根本利益，还是从亚太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三国都需要加强合作，而不是寻求对抗。百年历史已向我們展示了一幅清晰的合作与对抗的利弊得失的沉重图景。20世纪是这样，我们希望，21世纪将会有所改变。

值得提出的是，中美日三角关系已经是越来越受中外学者关注的重大课题。在1997-1998年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合作研究项目“冷战时期中美关系

再探讨”中，“中美日三角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就被列为一个子课题，并引起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我们期望，刘建飞博士的成果会成为一个良好开端，推动更多的学人关注并研究这个课题。

姜长斌

1999年6月6日

于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扑朔迷离的三角关系 (1899-1949)	30
第一节 三国关系的起步与发展	30
一、“华夷秩序”中的中国与日本	30
二、美利坚：西半球的不速之客	34
三、各自为战：中日抵御西方列强	44
四、“脱亚入欧”：日本跻身列强行列	48
五、肢解中国：日本的大陆政策	53
六、甲午战争：中美日角色大转换	57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之前美日在中国的斗争与合作	64
一、“门户开放”：美国海外扩张的王牌	65
二、美日联手抗俄：牺牲中国	68
三、美日较量：总是美国作出让步	73
四、脆弱的均势：实际是日攻美守	79
五、绥靖日本：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83
第三节 由中美同盟到美日同盟	90
一、蒋介石与罗斯福：不和谐的盟友	91
二、大转折：美国由扶蒋压日到弃蒋扶日	95
三、美国与日本：由仇敌变主仆	100
第二章 严重失衡的三角：美日与中国的对抗 (1949-1969)	104
第一节 难以避免的对抗	104
一、“一边倒”：新中国的选择	104
二、遏制中国：冷战的延伸	116
三、“一边倒”：日本无可选择	125
第二节 冲突与克制：对抗中的中美关系	128

一、朝鲜战争：冷战中的热战	128
二、两次台海危机：美国险些扣动核扳机	140
三、越南战争：中美暗中角力	152
四、对抗中的接触：缓冲器与测试仪	160
五、龙鹰相争：日本做了渔人	168
第三节 大起大落：美国因素制约下的中日关系	173
一、日本也是受压迫者：新中国眼中的日本	174
二、“日台和约”：日本求“小”失“大”	176
三、积累渐进：中国对日外交的新方式	181
四、两起两落：中日关系中的怪圈	184
五、大洋彼岸的美国：隔在中日邻邦中间的一堵高墙	189
第三章 站在一条线上：新三角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1969—1989)	195
第一节 结束对抗：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195
一、中国：“五大力量中心”之一	195
二、美国与日本：同床异梦的盟友	200
三、联华抗苏：“尼克松主义”的新战略	204
四、东联孙吴，北拒曹魏：中国调整外交战略	209
第二节 重构三角格局	213
一、越洋握手：最大的左派与最大的右派言和	214
二、奋起直追：“尼克松冲击”后的日本外交	222
三、中国：把握中日复交的主动权	229
四、超越美国：中日邦交正常化	236
五、美国：中日复交中难以避开的第三者	244
六、互补性的三角：中美日三边关系重新定位	248
第三节 新三角格局的巩固与发展	250
一、中日缔约：三个月可解决的问题用了近六年时间	250
二、中美复交：跨越鸿沟，30年特殊历史终于翻过	259
三、四角关系：三角互动中的苏联因素	270
四、十年蜜月：三角关系稳定发展	276

第四章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冷战后三角关系的变化

(1989-1999)	287
第一节 从低谷中走出的中美关系	287
一、美国：“反共产主义”的幽灵	287
二、“中国威胁论”：由“棒杀”到“捧杀”	301
三、遏制与接触：战略伙伴关系	307
第二节 不够和谐的中日关系	319
一、调整方向：日本要当“世界副总统”	300
二、互补与冲突：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	335
三、新的定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346
第三节 美日关系：新基础上的盟友	350
一、“下一次日美战争”：到底谁该说“不”	350
二、美日同盟：亚太小北约	355
第四节 面向新世纪：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	361
后记	369

绪 论

百年嬗变：和则互利 斗则俱伤

回顾一个世纪的进程，百年前的中美日关系与现在简直不能同日而语。1899年，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表明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开始积极介入亚洲的事务，尤其是中国的事务。而此时，中国正在遭受着列强的瓜分，英、法、德、俄、日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尤其是日本这个中国的邻邦，正在“脱亚入欧”，由被列强欺负、与中国同命运的国家变成列强之一，并同列强一道来瓜分中国。不仅如此，它还是列强中对中国最为凶恶、最有野心、最有威胁的一个。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中国遭受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而日本却从中得到难以估量的好处。1900年，美、日两国都参加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与美日两国关系完全是弱者与列强、羔羊与豺狼的关系。美日两国是八个列强中后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百年过去，虽然现在美日两国仍然是对中国最有影响的国家，但中国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已大不相同。三国已建立起互补、互利、互动的战略三角关系，维持这个三角关系的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三国各自的利益，而且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总结这百年三国战略关系的历史，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

从19世纪中叶，中国与日本的国门先后被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打开时起，中美日三国之间便形成了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三角关系。1844年，美国搭乘英国的便车闯入中国，中美签订了《望厦条约》；1854年，美国亲手敲开了日本的国门，签

订了《美日亲善条约》。自此，美国与东亚这两个最主要的国家发生了密切联系。但是，在“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之前，美国还不是东亚大国，对东亚的事情关注得十分有限。日本被迫打开国门后，起初同中国一样，试图抵御西方势力的入侵，但并未能同中国联手。客观地讲，联手也是徒劳的。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对华对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在对日对华政策上，始终是重日轻华，姑息日本，牺牲中国的利益。明治维新、门户开放和太平洋战争是1949年前中美日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关节点。

明治维新不仅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日关系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日两国基本保持友好交往的态势，而且，日本一直以中国为师，从中国学习、借鉴了许多东西，甚至有中日是“同文同种”之说。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向西方学习，并且在不断摆脱西方列强欺压的同时跻身于列强行列，与列强一起欺压瓜分中国。与此同时，日本逐渐确立了以侵略、肢解中国为主要内容的东亚战略，尤其是对台湾和辽东半岛抱有野心。以后的事态发展足可以证明这一点。

1874年，日本曾出兵占领台湾。由于当时台湾岛正流行疟疾，日军在台湾难以维持下去，经过谈判，中日签署协定，日本从台湾撤兵，清政府承认日军占台是“义举”，并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日本第一次侵占台湾的努力失败。

1887年，日本参谋部拟定了《讨伐清国策略》，规定1892年完成对中国作战的准备。这个任务如期完成。

1894年的中日战争后，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日本割占台湾和辽东半岛。后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辽东半岛以中国付给日本5000万日元的退还费为条件还给中国。日本占领台湾的愿望实现。

中日战争给日本带来极大的利益。且不说夺取朝鲜、台湾所带来的战略利益以及取得战争胜利所换来的国际地位提高，单是

巨额战争赔款就使日本得到无尽的好处。根据《马关条约》和《中日辽南条约》，中国赔款本利合计达 24233 万两白银，折合日元达 36408 万元。这笔款项相当于日本 1890 年财政支出（8332 万日元）的 4.3 倍多，保证了维持日本军备和奠定近代工业基础所需要的资金。日本有了这笔钱才得以采用金本位制，日本资本主义才能够把以国际市场为前提的贸易立国和工业立国作为新的目标。以这次战争为标志，日本成为东亚地区强国。

这次战争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害。这是中国自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它使清政府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列强以此次战争为契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当然，这次战争也促使清政府改变了对日政策。在此之前，清政府并未充分认识到日本的崛起及其将带来的威胁；此后，清政府意识到日本已成为列强之一，而且是对中国的安全最有威胁的国家，“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

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清政府面对列强的不断入侵，逐渐形成了“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试图利用列强间的矛盾。虽然在中日战争前后，清政府主要想借助俄国的力量来抑制日本，但是英、美等国也被清政府看成是可惜以抗衡日本的力量。

美国在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前尚处在大陆扩张时期，对远东的事务不太重视。但在对待中国上，美国也是列强的一个成员，与日本是伙伴关系。只不过相比之下，美国更重视经济手段，而日本则主要采用军事手段。在中日战争中，美国实际上站在日本一方。战争初期，美国驻华外交使节在处理日本在华间谍问题时，不但偏袒日本一方，而且千方百计地予以庇护，甚至不惜用伪造供词或证明的手段以欺骗中国。1894 年 10 月，在日军取得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的胜利后，当英国建议列强共同行动促成迅速议和时，美国则拒绝参加共同干预。美国持这种立场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小于在日本的利益，当时美国对华贸易额远低于对日贸易额；二是此时美国的主要注意力

还在美洲。

1894年中日战争后，日本继续推行既定的对华政策，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后，中国东北南部成了日本独占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机夺取了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改变对华战略，由肢解中国上升为独霸、灭亡中国。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表明了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又将势力扩向华北，直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开始积极参与列强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角逐。它一方面参加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直接侵略行动，另一方面又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想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取得优势地位。起初，门户开放政策主要是针对俄国的“划分势力范围”政策。日本利用美俄之间的矛盾，联美抗俄；而美国为了制约俄国的扩张，扶植日本。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美国给日本大量援助，除了提供4.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并帮助日本推销公债外，还提供大量的粮食及其它物质。此外，美国还在外交上帮助日本。为了使战争不受干扰，美国在战争一开始就要求与日本有矛盾并与俄国关系较好的德国和法国维持中立。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认为，日本是在为美国打仗。在美日蜜月期间，两国合作，扩大了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比如，中美、中日先后于1903和1904年缔结了新商约，中国被迫在东北开辟了新商埠。

日俄战争后，美日矛盾逐渐突出，成了争夺在华利益的主要对手。日本改变对美政策，开始联俄抗美。但是在1909年前西奥多·罗斯福任总统期间，美国在中日之间仍然是重日轻华。美国认为，中国毫无军事实力，如果与中国结盟，美国必将承担过多的义务，美国不能为了中国的利益而与日本开战，所以还是“选择了东京，而非北京”。1908年签订的《鲁特—高平协定》

集中反映了美国这种政策。为换取日本对美国在菲律宾和其它太平洋属地利益的承认，美国宁可牺牲它自己的在华利益，至于牺牲中国的利益就更是在所不惜。

1909年，威廉·塔夫脱出任美国总统后，开始调整对日对华政策。他认为“罗斯福姑息日本，情愿把美国在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换取日本的好感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此后的10多年间，美日在华的竞争加剧，美国试图运用其雄厚的资本来遏制日本在华的扩张。比如1916年日俄新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是日俄合伙控制全中国，并针对德国和美国）签订后，美国政府就建议日本政府要尊重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但是，由于美国的海军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过太平洋同日本较量的程度，美国对日本的斗争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每当双方矛盾激化的时候，总是以美国的妥协退让而告结束。这最终导致在美日的竞争中，日本占了优势。在1917年签订的《兰辛—石井协定》（即《日本和美国关于中国的照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华有特殊利益，表明美国向日本让步。

进入20年代后，美日在东亚的力量处于均势状态，双方都加强了在华势力。但在对待中日矛盾上，美国还是更容易同日本取得妥协而牺牲中国的利益。比如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为了使日本接受“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就姑息迁就日本，不惜损害中国的利益。正是由于美国的姑息养奸，日本的军事实力迅速增长，到1930年伦敦裁军会议时，日本与美国的海军力量差距已大大缩小。同时，日本在中国更加强了攻势。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这种攻势达到高潮，并且打破了美日在东亚的均势。

然而，面对日本的攻势，美国不但未进行有力的反击，反而对日本搞绥靖政策。直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上任后，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持较强硬的态度。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已经开动起来，美日之间的利益已尖锐冲突，矛盾无法缓解。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美国加强了对日本的经济制裁。1941年8月，美国宣布完全停止对日石油输出，断绝了日本的石油来源。在此前，日本所需的80%多的石油直接来自美国。日本铤而走险，袭击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美国政府长期对日本实行姑息、迁就的政策，最终把美国推向战争，这是美国长期迁就、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尝到的第一次苦果。遗憾的是美国决策者并不总是汲取这一历史教训。

中国面对日本不断升级的侵略，在外交上仍然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随着美国在东亚力量的上升，中国逐渐把美国当成制约日本的主要外部力量。1908年5月，美国向清政府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极大地赢得了清政府的好感，清政府随即正式派唐绍仪为专使前往美国答谢。唐此行更主要的目的是试探中、美、德联盟的可能性，同时吸引美国资本支持东三省银行计划。然而回敬清政府这番良好愿望的却是美日签订《鲁特—高平协定》。

当然，中国利用美日矛盾也有成功的时候，比如1918年，北洋政府乘沙俄垮台之机，利用美日矛盾，派军进驻中东铁路路区，依次收回护路权、行政权、司法权和最高监督权。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中国利用美日矛盾或寻求美国支持，都以徒劳为结局。比如，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试图就恢复中国对山东主权问题得到美国的支持，可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深怕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为了拯救国联，向日本的蛮不讲理态度屈服。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成为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之前，在中日之间，美国始终是姑息日本，牺牲中国。罗斯福政府虽然对日本的政策有所改变，但仍有很大的姑息成分。“七七事变”爆发后，美驻日大使格鲁致电国务卿赫尔，提出美国基本目标应是避免卷入，保持中立。只有当日本的侵略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时，美国才作出应有的反应。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中美日

关系实际上处于调整过程。经过美国的两次政策大调整，三角关系又恢复到了近似于太平洋战争前的那种局面，即美国重日轻华，扶植日本。

珍珠港事件打破了美国对日本的幻想，使美国长期推行的姑息政策彻底破产，也使美国改变了对华政策。战争期间，美国除了向中国提供大量的援助外，还积极扶植国民党中国，使其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罗斯福想要“使中国成为远东的主要稳定因素”，“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强大、亲美、统一’的国家。”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还倡议支持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参加战后国际组织。然而，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和扶植完全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美国出于军事上的考虑，需要中国同日本作战。可是国民党政府在这方面并没有与美国认真合作。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掌握主动权，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的依赖减弱，对华援助便急剧下降。为了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罗斯福还牺牲中国利益，在未与中国政府商量的情况下，满足苏联的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

战后初期，美国把国民党中国看成是它的势力范围，在中国内战中积极扶蒋反共。美国虽然很了解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无能，但在国共两党之间还是选择了国民党。美国实现了对日本这个亚洲唯一工业国的单独占领后，起初对日采取的是以打击和限制为主的政策，目的是使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从1948年起，随着美苏冷战的全面展开，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并攻打锦州、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美国政府内部开始逐步调整对华和对日政策，将远东战略重点由中国转向昔日的对手日本，对日本由打击和限制转为扶植。以后，随着远东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快了对日本扶植的步伐，将之变成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和遏制中国与苏联的前沿阵地。

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 70 年代初中美缓和、中日复交前，中美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方针，美国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将中国看成敌对力量，奉行遏制中国的政策。50 年代，中美在朝鲜战争中进行了直接的军事较量，在两次台湾海峡危机中一度在军事上尖锐对峙，60 年代又在越南战争中暗中角力。这是中美两国关系最为暗淡的时期。由于美日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同盟关系，中美关系的状况直接制约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美国因素制约下的中日关系发展上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一度失去外交自主权，被迫就范，确定对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尽管如此，中国一直努力发展中日关系，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由于美国因素和中美关系的制约，中日关系几起几落，最终没能发生质的飞跃。

建国初期，新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及其支持下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对中国来说，中美矛盾已取代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同时，在中国领导人的眼里，日本已处于受欺侮、受压迫的境地，正在变成美国占领下的殖民地或附属国，日本对中国的安全不仅构不成直接的威胁，而且还是不同于美国的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在 1951 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日本虽然被列为防止侵略的对象，“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或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但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条约将主要矛头直接对准日本主要是因为中苏与日本还未结束战争状态，表面上日本还是公开的敌人。而且日本是战败国，声名狼藉，将矛头对准它有助于得到曾遭受日本侵略国家的同情。

基于主要矛盾转换和日本地位的变化，中国对日基本方针是